

DOI:10.15886/j.cnki.hnus.2019.03.005

# “用经典涵养正气”:大数据时代社会公德治理新理路

邓映婕, 王晓丽

(华南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广东 广州 510640)

**[摘要]** 现代社会,马克思主义经典中体现的道德指向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典籍中蕴含的优良美德失去了和个体生活联结的通道,社会公德运行机制阻滞,社会正气消沉。大数据的出现打破了社会公德治理固有的运作模式,可基于物联网的大数据共享共治、精准传播、价值引领功能,畅通社会公德运行机制,重构经典与个体生活的联结通道,进而涵养社会正气,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落地。

**[关键词]** 经典;正气;大数据;社会公德治理

**[中图分类号]** G 1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 - 1710(2019)03 - 0032-07

当代中国社会公共生活领域不断扩大,道德对象广泛且具有即时性和偶然性,社会公德领域面临一系列新情况,新的公共交往、公共环境、公共秩序呼唤新的社会公德治理方式。以经典涵养正气是发挥道德治理实效性的有效途径。现代社会中,我们在实践中强调马克思主义经典、红色经典、优秀传统文化经典在弘扬社会正气中的价值,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我们也应该看到,以经典涵养正气也面临一些问题,还需要进一步加强。

## 一、社会公德运行机制阻滞

《说文》曰:“德,升也”<sup>①</sup>，“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sup>②</sup>,表明了“德”即“得”,“德”“得”相通,于己于人都有所“得”是谓“善”。梁启超将社会公德视为立国之本,他认为,“公德者,诸国之源也”,“从相善其群者谓之公德”,“有益群者为善,无益于群者为恶”<sup>③</sup>。依据对公德中“公”的不同理解,社会公德有两重含义:第一,当“公”指公众、大众时,“公德”即为公众、从众之德;第二,当“公”指公共生活领域时,“公德”即为公共生活领域中的道德,与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对应。与本文旨趣一致,在公众、大众之德层面上使用社会公德概念。

社会风气是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反映了社会群体思想道德观念和精神面貌的状况。梁启超曾提到:“我国民最缺者,公德其一端也”<sup>④</sup>;梁漱溟也一针见血地指出:“公德,就是人类为营团体生活所必需的那些品德,这恰为中国人所缺乏。”<sup>⑤</sup>尽管时代不同,却共同印证了中国公民社会公德缺失的客观现实。而社会公德失范必然伤及社会“元气”,不正之风的“杂音”影响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收稿日期]** 2019-02-23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16BKS105);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一般项目(2016GZYZB45);华南理工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项目(2DXM101)

**[作者简介]** 邓映婕(1991-),女,广东罗定人,华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8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典文化传播研究。

**[通讯作者简介]** 王晓丽(1974-),女,河南洛阳人,华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大数据社会公德治理、人的发展等研究。

① 许慎:《说文解字全鉴·珍藏版》,李兆宏,刘东方译,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2017年版,第272页。

② 孟子:《孟子》,牧语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79页。

③ 梁启超:《梁启超选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16页。

④ 梁启超:《新民说》,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62页。

⑤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59页

经济生活领域，功利之风存在。市场经济确立利益至上原则，但是人们稍不注意就奉其为圭臬，受到利益、金钱的宰制，忽略道德引发道德困难。“毒奶粉事件”“染色馒头事件”“假鸡蛋事件”“长春疫苗事件”等不和谐因素影响，干扰着正常的经济生活和市场秩序，“理想、理想，有利就想”“前途、前途，有钱就图”的思想削弱了社会公德的感召力，经济生活领域物欲主义、拜金主义、利己主义等社会风气的不良倾向浮现。

政治生活领域，贪污腐败之风存在。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sup>①</sup>我国各级领导干部在人民授权下行使公共权力，这决定了政治道德处于社会公德的核心地位。当前，有的地方和部门正气不彰、邪气不祛；“明规矩”名存实亡，“潜规则”大行其道；求真务实、埋头苦干的受到排挤，好大喜功、急功近利的如鱼得水<sup>②</sup>。作为最高层次的道德实践主体，少部分官员置“为人民服务”于不顾，以一己私利泯灭了公德心和公义心，将权力视为获取利益、享受特权的敲门砖，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阻碍了社会风气的良性循环。

文化生活领域，虚假之风存在。一方面，在文化与市场相融合的过程中，受市场经济所催生的趋利主义侵蚀，部分文学艺术工作者和新闻媒体为追求市场效应，以“三俗”作品迎合市场，忽视了文艺作品、经典作品的精神导向，“戏说风”“言情风”“打杀风”等歪风滋长。另一方面，受功利和浮躁的不良风气影响，一些学者沦为虚名假利的奴仆，抄袭剽窃、学术交易等行为亵渎了科学精神，部分科研工作者不仅没有以高尚的作品鼓舞人、以优秀的道德引领社会思潮，反而助推了社会不正之风。

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本末”之辨与社会公德的内涵相耦合，“本”指道德之内在本真，即德性良知和道义精神，“末”指道德之外在形式，即具体规范和个人行为。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sup>③</sup>行为主体若丧失了道德之“本”就不可能自觉地践行社会公德，社会公德失范现象随之出现。社会公德价值层面的失落、规范层面的失效以及个人行为越轨共同导致了社会不良风气蔓延。

## 二、造成社会正气混沌的原因

道德之立，所以利群也<sup>④</sup>。传统社会，经典中的道德价值对弘扬社会正气、凝聚精神力量发挥一定作用，然而现代社会却忽视了这一作用，经典的弱化是造成社会正气混沌的原因之一。传统文化经典、红色文化经典、马克思主义经典中的道德精髓在传承的过程中没有实现创造性转化，学经典、悟经典、用经典的社会风气不足，从而难以充分发挥经典在张扬德性良知和引领道义精神方面的作用，这是社会公德治理层面的一个“短板”。

首先，道德宣传、教育、规范中经典的“缺位”导致学经典的氛围不足。“道在人伦日用，不在深山穷谷也”<sup>⑤</sup>。“积思勉之功，旧习自除”<sup>⑥</sup>。经典是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凝结的文化精华，经典阅读和经典教育是现代人道德智慧的来源之一，学懂、弄通经典中阐释的道德价值才能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说过：“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sup>⑦</sup>而反观社会现状，经典的教化与传播在社会公德治理体系中丧失了立身的基础，深陷“断裂”与“缺位”的尴尬境地。在高校，曾经占据着重要位置的传统经典文化及其价值观念正在从中心走向边缘，经典在学科中“失语”、教材中“失踪”、论坛上“失声”，甚至不断遭受来自现代性教育理念的冲击。有关经典选读的课程、讲座、读书交流活动淡化，导致学生对经典著作的熟悉和掌握程度不深，难以激发学生对经典学习的热情。学校德育、社会宣传的经典“缺位”，引发了社会公德治理的文化困境与价值危机，社会公众尤其是领导干部难以将读经典、学经典视作一种生活习惯。

其次，经典的道德滋润、教化功能式微，导致对经典文化的认同感淡漠。费孝通指出：“礼不是靠一个外

① 孔子：《论语》，刘兆伟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18 页。

② 习近平：《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16 年 1 月 12 日发布），<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6/0503/c1001-28319087-2.html>，2019 年 4 月 15 日访问。

③ 孔子：《论语》，第 284 页。

④ 梁启超：《新民说》，第 65 页。

⑤ 黄元吉：《〈乐育堂语录〉新译》，孔德译，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483 页。

⑥ 陆九渊：《陆象山集·语录》（35 卷），北京：中华书局 1980 年版，第 454 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8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61 年版，第 121 页。

在的权力来推行的,而是从教化中养成了个人的敬畏之感,使人服膺。”<sup>①</sup>长期以来,经典被视作束之高阁、藏于书斋的抽象理论,和民众有距离感。荀子曰:“真积力久则入,学至乎没而后止也。故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sup>②</sup>经典的传授和学习若只是浅尝辄止,而没有仔细研读、阐释经典中蕴含的道德意蕴,则经典中的道德精华并没有真正入脑、入心,致使民众也缺乏对经典的敬畏和经典衍生的道德责任感、使命感。如在对待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问题上,有的同志仍存在认识不深、理解不透的现状,把马克思主义经典当作过时的理论,致使马克思主义经典的传播沦为意识形态说教,难以将马克思主义思想内化为清醒的道德自觉、坚定的道德信念和规范的道德行为。

最后,用经典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意识不足。经典所蕴含的理论和实践生命力为社会公德治理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打下了方法论基础。《论语》云:“人能弘道,非道弘人。”<sup>③</sup>理论的生命力在于不断创新,读经典、悟原理,最终的落脚点是要将经典中的道德原则和价值理念同我国社会公德现状、行为规范要求以及公德规范模式构建紧密结合起来,在社会公德治理的生动实践中观察时代、解读时代、引领时代,彰显经典的道德力量。然而,在网络快餐文化的影响下,经典的道德价值不断旁落。一方面,传统的价值体系已经失去时代感和现实意义,将没有情感的文本转化为精神需求,没能真正实现经典的传承。经典的传承被局限在单纯的文本上,文本本身无法大众化,经典中的道德价值无法实现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对社会公众欠缺道德感召力和吸引力。另一方面,将经典与历史条件和现实情况相结合,聆听社会道德需求,回应社会道德问题不足。经典的道德价值没有落实到解决时代问题上来,也没能用丰富的道德实践来推动经典的创新发展。经典的遗落使社会公德治理缺乏了凝聚社会正气的道德话语和价值体系,动摇了社会公德治理的效果。而要重建崇德向善的社会氛围,弘扬敬奉先贤的良好风气,要坚持以立为本,立破并举,如何“立”,就是要深入挖掘经典的道德价值,从“经典忽视”走向“经典自觉”,进而涵养社会正气,让社会充满向上向善的正能量。

### 三、重拾经典与社会公德治理转向

经典是在长期的文化积淀中浓缩而成的精神财富。通过经典蕴含的道德力量,激发公众敬畏道德、做“道德人”,从而引导公众将道德理念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最终成为道德的传播者、践行者和受益者,以达到涵养社会正气的最终目的。经典蕴含的道德净化和价值引领功能具有春风化雨、滋润人心的“软”效果,有利于将社会公德失范化解于无形,对传播主流价值、陶冶公众道德情感、引导社会风气具有积极意义。“浇风易渐,淳化难归”,经典的错用和弱用使社会风气出现问题,而社会风气的正面引导和复归需要“绵绵用力,久久为功”,因此,重拾经典成为推动社会公德治理转向,重启社会公德运行机制的前提。

####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是培植社会正气之本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产党人要把读马克思主义经典、悟马克思主义原理当作一种生活习惯、当作一种精神追求,用经典涵养正气、淬炼思想、升华境界、指导实践。”<sup>④</sup>马克思主义经典之所以能够涵养正气,在于文本之内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真理性科学性。作为人民的理论,它阐述了为人类谋和平、谋幸福、谋发展的价值理念;作为实践的理论,它为改造生活、改造社会提供了精神动力和价值引领;作为开放的理论,它紧接时代地气,依据时代发展和人民的需求不断探索新问题、解决新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中所蕴含的大公无私、人人平等、人人自由、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等价值理念,养分丰厚,育人于无形,能够提升每一个研读者的境界觉悟,培植其精神正气,为涵养社会公德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为做人、做事、做官提供了方法论指导<sup>⑤</sup>。此外,红色经典是马克思主义经典的时代体现,是民族独立解放的历史记忆,其中蕴含的价值元素塑造了自强不息、埋头苦干、开拓进取的民族人格和民族精神。

一方面,当代中国领导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党员群众要提升“大人君子”的修养、涵养自身正气、凝聚道德共识,深入学习、领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经典是必由之路。通过学懂、弄通、悟透经典中的道德

① 费孝通:《乡土中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9页。

② 荀子:《荀子》,沈阳:万卷出版公司2009年版,第7页。

③ 朱熹:《论语集注》(卷8),见朱熹:《四书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67页。

④ 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26页。

⑤ 陈祖召:《以经典涵养正气 用原理指导实践》(2018年5月31日发布),[http://www.qstheory.cn/laigao/2018-05/31/c\\_1122920482.htm](http://www.qstheory.cn/laigao/2018-05/31/c_1122920482.htm),2019年4月10日访问。

意蕴,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来指导实践,进而坚定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培养自身优秀品格。只有夯实理论功底,才能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理解并揭示自然界、人类社会、人类思维各种现象,进而更好识别各种唯心主义观点,抵御各种历史虚无主义谬论,保证思想的先进性、纯洁性,树立崇高的理想信念。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经典中蕴含的共产主义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对于团结凝聚社会力量,进一步打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和社会风尚具有现实意义。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sup>①</sup>这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推动整个社会的精神风尚,引领社会道德正气,为中国走向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提供方法论指导。同时,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中蕴含的政党建设思想、文化建设思想、社会建设思想、人与自然的的关系思想对于培育社会公德意识、构建和谐社会依然具有重要价值。

## (二)优秀传统文化是传承社会正气之根

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sup>②</sup>传统社会中,道德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手段,在维护社会秩序、保障国家稳定上发挥重要作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典籍中记载的做人、做事、做官之道以及“仁、义、礼、智、信、忠、孝、悌、节、恕、勇、让”的道德观,孕育了中华民族的宝贵品格和崇高价值追求,为调理社会关系、保证社会和谐稳定、鼓励人们向上向善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力量和道德支撑。孟子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sup>③</sup>苏东坡在《潮州韩文公庙碑》中所说:“浩然之气,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随死而亡矣。”<sup>④</sup>在传统经典中,社会正气是合乎义和道的、正直的崇高品质,是日积月累的正义所生长出来的,而不是偶然地有过正义的举动就取得的。正气充沛,则邪不胜正;正气羸弱,则社会百“病”俱生。经典中以文化人、以文育人、以文培元的道德力量能够启迪思想、陶冶情操、温润心灵,进而广泛凝聚社会正气。

习近平在多次讲话中引经据典、身体力行地唤醒和传播经典的道德精华,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提到为官之道时,习近平引用了《论语·里仁》里“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sup>⑤</sup>的道德典故,强调做官要立德、立言、立行。而后引用《老子》中的“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sup>⑥</sup>,告诫党员干部要为官清正廉洁,常怀知足之心,提高防腐拒变能力<sup>⑦</sup>。同时,在多个场合化用曾国藩的“为官避事平生耻”<sup>⑧</sup>的经典诗句,勉励领导干部要“为政以德”“守土有责”。提到立德树人时,习近平引用《国语》中的“从善如登,从恶如崩”<sup>⑨</sup>来说明从善难,从恶易的道理,鼓励青年树立良好道德品质<sup>⑩</sup>。同时,借用“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sup>⑪</sup>,弘扬“大人之学”“君子之学”,强调大学要培养学生“大人君子”的修养和光明正大的品性。由此可见,经典承担着正导向、转作风、树新风、育人才的历史使命,是到达“至善”境界的修身良方。《习近平用典》一书生动呈现习近平总书记讲话和文章中的典故,是继承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涵养社会正气的一个重要契合点。通过精选经典国学中立德、修身、笃行、劝学、廉政、信念等内容,或表达传统美德,或彰显民族精神,或重视立德树人,将经典的独特魅力渗入人心,赋予了传统美德鲜活的时代价值。《中国诗词大会》以诗词鉴赏、文学竞赛的形式拉近经典与观众的距离,让经典与时代同步,唤醒观众的经典情愫和文化情结,进而回归经典、认同经典。习近平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道德教育的“好教材”,在帮助人们正确处理义与利、己与他、权与民、物质享受与精神享受等重要关系上发挥了一定作用,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里,特别适合生长“和谐社会”的果实<sup>⑫</sup>。通过研读典故,将中国传统美德的独特魅力渗入人心,时刻警醒自身知荣辱,明善恶,树立正确的是非观、利义观,进而服务于社会,向世界传播和平与合作共赢的正能量。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39页。

② 孔子:《论语》,第19页。

③ 孟子:《孟子》,第59页。

④ 林语堂:《苏东坡传》,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5年版,第311页。

⑤ 孔子:《论语》,第70页。

⑥ 老子:《道德经》,北京:华文出版社2010年版,第242页。

⑦ 习近平:《领导干部要认真学习 老老实实做人 干干净净干事》,《学习时报》2018年5月26日第1版。

⑧ 曾国藩:《曾国藩文集》,北京:九州图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498页。

⑨ 左丘明:《国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95页。

⑩ 习近平:《在同各县优秀青年代表座谈时的讲话》,《人民日报》2013年5月5日第2版。

⑪ 李一冉:《大学》,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8年版,第2页。

⑫ 胡永新,李海晶:《习近平用典的当代价值》,《江西社会科学》2016年第1期,第197页。

习近平的以德治国理念,大量地借鉴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与中华文化典籍中“向上向善”的道德资源,紧密结合中国社会发展实践,从经典中获取能量,又使经典在新的实践中获得新的生命力。因此,重拾经典价值,具有涵养社会正气的现实性,同时,经典复归又是走出社会公德治理困境,实现社会公德治理可持续发展的时代诉求。

### (三)传统社会公德治理措施运行不畅

第一,共享共治共同参与不足。在传统的社会公德治理中,道德被视为治理的手段和方式,在这种管理模式中,“政府当然承担社会公德治理的主体责任,由于建设主体的单一性和非平等性,难以激发建设的主动性和协同力量,特别是治理效果难有根本性的突破”<sup>①</sup>。同时,传统的经典传播方式以自上而下的教育、宣讲为基本理念和路径,使公民成为一种被动式的对象性存在,公民处于“被建设”“被教育”的“下层”位置,往往被视为消极意义上的道德治理对象,被动接受统治阶级的道德安排,将道德视作束缚自由的缰绳,难以触及社会公德治理的实质。尽管在权威性和规范性之下,有一定的实效性,但随着现代社会网络化、价值多元化带来的各类挑战,这种模式并不能适应现实需求。在这种模式的持续作用下,政府、社会、个人行为难以形成合力,经典所蕴含的道德滋养功能往往异化为外在强加于公众自身的约束,而不能真正推动社会公德治理。

第二,针对性不足。传统的经典传播方式是以文本为主的灌输式传播,没有以社会公德的培育为着力点来传播经典,而是以经典论经典。在培育手段上,缺乏对对象个性和需求的关注和把握,受众被动地接受经典的灌输,弱化了受众对经典的认同和践行,经典道德功能发挥成效式微。在效果反馈上,传统社会公德治理手段对治理效果无法进行及时、全面的描述与跟踪,对经典传播各环节定位不准,对受众偏向、喜好的分析和预测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和滞后性,即便是时间足、投入多,往往因为样本量不够大、不够全,导致传播效果受限。

第三,引领不足。在公共生活空间不断扩展、私人生活空间不断压缩的时代背景下,传统社会公德治理理念和思路遭受挑战。传统社会公德治理手段难以找准推动经典传播的载体和方式,难以通过看得见、记得牢、感受深的方式,让经典的道德价值走进百姓心中,充分发扬经典的感召力、影响力、带动力。从传统的经典文本叙事内容与编排上来看,娱乐化、轻阅读的传播趋势使得经典的厚重感遭遇冲击,传统经典文本的宣教传播模式在新媒体时代已产生不适感。

当前社会公德治理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不是由于社会本身带来的,而恰恰是社会公德治理手段发展不充分所造成的,因此,只有转变社会公德治理思维和手段,才能建构新的社会公德治理运行机制,重现经典与社会正气合奏,实现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而以共享共治、精准传播、价值引领为主要特点的大数据恰恰弥补了传统社会公德治理的不足,为推动社会公德治理思路、模式、渠道转向提供技术支撑。

## 四、立足大数据传播经典,实现社会风清气正

《中国成语大会》《中华好诗词》《汉字英雄》《马克思靠谱》等栏目的播出,让越来越多的人感受到经典的魅力,激发更多的人去了解 and 关注经典的道德意蕴。同时也证实了,经典中的道德价值与社会正气的涵育是相耦合的,经典只有进入群众视野,观照群众生活,表达群众心声,才能真正刻在群众心坎里。借助大数据的共治、精准、引领功能来强化这种内在关联性,激发全社会读经典、悟经典、用经典的热潮,进而涵养个体的蓬勃朝气、昂扬锐气、浩然正气,以推动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生成,为时代明德。

### (一)信息共享功能促进了多元主体协同治理

大数据社会公德治理的核心思想是“共治”,通过整合、共享社会各种资源,动员社会多个主体来共同参与社会公德治理,实现资源协同、制度协同、方法协同,形成人人有责、人人尽责、多元互动的综合治理局面。首先,主体发生了转变。社会公德治理不再由政府大包大揽,而是在政府、企业、个体的共同参与、互动、反馈中完成治理。其次,客体发生了转变。社会公众由原来的被动的治理对象实现了从“自然人”到“单位人”,再到“社会人”,进而走向“治理主体”的转变,从道德责任他治走向自治与共治。再次,手段发生了转变。社会公德治理由法规命令、政策实施等硬手段转向道德协商、道德浸润等软手段。最后,主客体关系发生了转变。由

① 李兰芬,欧文辉:《公民道德建设的“治理”转向》,《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第37页。

政府自上而下的单向度管理转向公民参与的双向度互通。

经典进入大数据，在直接发挥道德传播功能的同时，形成政府、企业、公众三方协同治理是关键。物联网关联的大数据平台为经典的传播、培育、学习提供了便利，在多元化主体的积极参与下，打破了你教我学的单一状态，使每个个体、群体都成为学习的主体、教育的主体、传播的主体，任何人都可以随时通过大数据平台学习经典、传播经典、发表心得体会，在共享、共治、参与中达成共识。各主体借助大数据优势确立目标、协商合作、共同实施的互动过程，构建教和学的统一体，共同推动经典传承，努力营造社会共建共治共享的发展环境。一方面，数据的开放促进全员参与经典学习，利用全社会的智慧产生数据红利，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经典学习强国。立足大数据的多元主体共享共治，减少了整合数据、传播经典、信息反馈的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使得同一平台上能够以多种形式融合多种文化经典内容，以不同的媒体形态呈现在公众面前，有利于推动经典更贴近群众。另一方面，大数据成为链接政府、社会和群众之间的纽带，打破了传播途径的单一性和局限性，拓宽了交流互动的渠道。大数据平台以其方便群众参与和互动等特点实现了经典传播的“去中心化”，人人都是经典文化传播的受众者和发起者，政府、媒体、大众自发、自觉、自主传播经典，推动经典渐成社会风尚。广大民众还可以通过大数据平台来表达自己的对经典文化的需求，供政府和企业参考，大数据公司在政府的主导和引导下根据民意来改善、创新经典文化服务方式。

## （二）信息的精准定位提升了经典传播的实效性

大数据深刻改变了经典的传播理念、传播范式和传播效果。充分利用大数据信息容量大、分析精度高、反馈问题快等特点，实现经典因时、因地、因人传播，强化传播内容的可信性、普适性、贴近性，已成为新时代社会公德治理的必然选择和全新课题。

第一，实现信息的精准传播。依托大数据平台，凭借最新的科技成果作为技术支持，经典的传播路径发生转向，打破了单纯的文本传输模式，强调在传播的过程中，充分利用海量的数据，分析受众的个人喜好，确保传播内容满足个体差异化需求，让经典更接近受众个体。

一方面，运用大数据的分析技术查找传播受体的关注点，调整传播语言，以增强经典的传播实效<sup>①</sup>。依托网络平台，利用大数据技术，企业、媒体不仅可以及时推送与经典相关的内容，还可以以移动终端为传播媒介，根据个人喜好以及受众的不同层次为受众“量身打造”定制化的内容，实现经典节目、文本的精准推送，并不断提升传播范围和传播质量，以适应大众的需求和思维方式。这种单维度传播向双向选择的转变过程，以收视目标人群的相关数据分析作为策划、制作、营销的支撑，实现受众“按需获取”，使经典的输出不再“空对空”。另一方面，大数据充分发挥了传播定向性、分众性和潜在性功能，捕捉传播的未知受体。通过关注用户对经典文本的网页浏览记录，在后台标记用户阅读经典、搜索经典的敏感度。此后，用户在检索其他内容的同时，会被提供多种与经典相关的内容，这就意味着用户的个人兴趣与需求是完全可以被重新定位的，系统可以自动、精准、高效地捕捉到每一个用户个体对经典的认识和反应，并且可以基于用户与其他群体的关联度扩大经典的传播范围。对经典的精准推送，摆脱了传统“点对点”式的为受众提供相同内容，而是基于大数据的网页数据抽取技术，精准表达内容，使得内容遵循个性化、差异化。

第二，实现信息的精准反馈。经典在网络传播的过程中会呈现出不同特点，依托大数据追踪经典在传输过程中的变化发展，分析大众使用经典的整体趋势。针对薄弱之处着力，加强经典资料的发放，进而强化经典的专题学习，定制特色的学习方式。

一方面，借助大数据追踪经典传播的效果，制定精准有效的传播策略。通过大数据平台反馈的受众点赞量、评论量、转发量挖掘受众的关注点，通过分析数据的峰值来调整经典输出方式。以《中国诗词大会》节目为例，大数据监测情况显示，在节目播出的10天中，节目组和观众累计发出3万余条微博，获得了6万余条评论，18万余次转发，以及超过33万的点赞量，每发出1条微博，就有2条评论、6次转发、10次点赞，1条微博引起18次关注，具有18倍的传播效能<sup>②</sup>。以《习近平用典》政论微视频为例，人民日报微博客户端的数据统计，平均每集转发量达5000次，评论3000余次，微信公众平台相关推送量约达150万次<sup>③</sup>。大数

① 赵兰香，郭跃军：《大数据时代马克思主义传播探析》，《人民论坛》2016年第6期，第215页。

② 赵淑萍，付海钰：《文化类综艺节目的价值导向与传播特征——基于《中国诗词大会》（第二季）的数据分析》，《电视研究》2017年第4期，第61-62页。

③ 刘育然：《浅析融媒体时代政论微视频的传播特点——以《习近平用典》为例》，《新闻研究导刊》2018年第8期，第67页。

据经典传播基于实时的受众评论、反馈数据,借助大数据整合、分析手段重新界定新的经典文化传播方式,为节目的完善和发展提供了参考。另一方面,数据反馈模式在受众自然、主动的互动中获取信息,突破了传统调查方式的人为痕迹,摆脱了个体“被调查”心态,能够更加准确地分析、掌握受众学习经典的思想动态和反应趋势,实现对受众心理和行为全面、动态、长期的精准评价。通过数据可以了解受体的喜好、个性,充分掌握经典在传播中已经遇到或可能遇到的问题,并根据数据的预测情况合理地调整、设计传播内容,从而在传播情感、态度上增强效果。

### (三) 海量信息的舆论效果增强了经典的价值导向

大数据时代,网络传播强化了经典的价值导向,使经典更加富有可读性,在内容上更加渗透对经典的解读、阐释,做到贴近群众、贴近生活、贴近实际,在无形中扩大了经典的影响力,强化了经典的价值引领力。

首先,大数据平台的信息整合、传播、发散功能有助于增强经典的感染力和渗透力,拉近经典与受众的距离。大数据背后是众多社会关系的“总和”,个体在接收和传递信息的“自然流露”,实现了经典“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增加了经典的说服力和渗透力,从而摆脱了经典说教、灌输式的传播方式,使经典深入人心。通过经典的滋养激发人们的道德良知和道德责任感,在感知和实践“德”的同时通过社会舆情压力将社会公德治理落到实处,抑制失德行为和歪风邪气,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其次,运用大数据可视化分析技术增强经典的可读性,既强化了受众对经典的感性认识,又深化了受众对经典的理性认同,将“故纸堆”里的典故赋予了“新生命”。在大数据的作用下,经典以读文、读题、读图等多种形式传递可能多的信息,将抽象、难啃的经典著作赋予图片、视频的直观形式。最后,善用大数据视域下经典的传播激发社会舆论的道德力量,真正实现经典的“扬善”功能。经典的价值引领功能通过个体认同和舆论监督两种力量的作用实现,大数据的运用强化了经典的舆论效果,让经典可以进入到生活的各个领域,让学习经典成为一种常态,成为影响个人生存的道德力量,推动正向社会舆论的形成。大数据平台改善了传统社会公德治理“直、硬、强”的面孔,在最合适的时机,用最恰当的表达方式将经典呈现在受众面前,通过经典的传播输出主流价值观,引领整个社会形成良善的社会风气和坚定的道德信念。大数据时代,充分发挥大数据的引领作用,以经典正本清源,以精品奉献人民,以明德引领风尚,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将其呈现在荧屏上,运用在生活里。

[责任编辑:吴晓珉]

## "Cultivate Righteousness by Means of Classics ": A New Method of Social Morality Governance in the Age of Big Data

Deng Yingjie Wang Xiaoli

(School of Marxism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angdong, Guangzhou 510640)

**Abstract:** In modern society, the moral guidance in the Marxist classic and the virtues in the Chinese culture have lost the channel of connecting with the individual life, which leads to the obstruction of the operational mechanism of social morality and the depression of social. The emergence of Big Data breaks the inherent mode of social morality governance. Based on the shared rule, accurate dissemination and value leadership of Big Data, we can smooth the operational mechanism of social morality and reconstruct the connecting channel between classics and individual life, so that cultivate social righteous climate and realize the landing of socialist core values.

**Key words:** Classics; Righteousness; Big Data; Social Morality Governance